

出版研究年会文集

1990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1990

出版研究年会文集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東方出版社

出版研究年会文集·1990

CHUBAN YANJIU NIANHUI WENJI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封面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程凤琴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 字数/311,000

版次/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91-4/G·36 定价 6.80 元

编辑说明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四届出版研究年会于1990年4月在南京举行。这次年会是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五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联合召开的。会议主要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建国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出版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觉性,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学术民主、各抒己见,达到增强团结的目的,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作者和代表100多人,提交论文,其中包括有关编辑工作的,出版工作的,发行工作的等。特点是研究的主题比较广泛,理论联系实际。作者除出版、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外,还有教育界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等。可以说是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一次空前的盛会。

根据中国版协出版研究年会编辑文集的惯例,故出版这本文集。但限于篇幅,论文未能全部选用,只选录42篇,确是十分遗憾

的。我们感谢论文作者和各省、市(自治区)版协的大力支持,并向东方出版社表示谢意。本文集的编辑工作,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教。

1992年2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图书属性论略	郑清源
9	论图书社会效益的价值	杨福智
18	略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汪 诚
27	论我国出版方针的丰富内涵	张业汉
35	论出版导向	张辉冠
48	论出版社的性质	张训智
57	必然来临的开拓性发展	高 斯
	——略论八十年代的江苏地方出版事业	
75	试论地方出版社的十年改革	王铸人
86	“扫黄”反思	李曼如
95	整顿出版秩序的回顾与思考	陈震雷
106	宏观上要控制出版社的发展	刘善继
114	反腐促廉 深化出版改革	赵玉秋

DN188/50

122	通货膨胀与出版业	朱克威
131	关于“一窝蜂”现象	孙五川
139	图书质量生命论	程志方
149	试论出版社的质量管理	岳家俊
165	优化选题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王本金
174	出版组织学初探	巢 峰
195	深化民族地区出版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张 田
204	我国编辑工作的历史传统	李瑞良
216	“编辑”的溯源、探流及正名	杨明新
223	编辑人员的修养	马大谋
	从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谈起	
230	杂家、杂家型编辑和编辑杂学修养	孙培镜
246	努力造就一代新型的编辑出版队伍	冯如升
	——浅谈出版队伍建设	

257	编辑人际关系剖析	黄 奔
268	编辑工作改革:何去何从	徐柏容
277	对期刊编辑工作若干问题的一些思考	刘 以
290	试论地方出版志的编纂工作	魏启元
300	论图书评论学	向志中
309	主渠道要以多发好书为己任	
	改革十年的思考	赵锦伦
320	要有一个完整、系统、总体的出书构思	沈虎根
323	方向正而后事业兴	
	——出版基本经验浅谈之一	林 革
330	略论当前图书发行治理与整顿中的几个问题	罗树爱
337	云南民族出版的回顾	周嘉谟
348	论民族地区的图书出版和经营	金正磐
360	谈新形势对编辑的新要求	潘国华

368	浅谈图书进货工作的全期管理	张建国
375	为农业服务是图书出版发行一项战略性任务	新翰恢
380	深化农村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王 建
390	从实际出发 探索农村发行的改革	赵锦革
397	坚持改革,创办具有民族特色的图书发行事业	张芳澍
403	农村图书发行的问题与策略	揭济业

图书属性论略

郑 清 源

在关于图书属性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把图书当成纯商品,甚至主张图书的完全商品化,按图书市场的要求左右图书生产的运行机制。这种主张的结果是,导致图书出版、发行秩序混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方便。在全面治理和整顿图书市场的今天,有必要对图书的属性问题加以重新的研究和认识。

属性是拉丁文 *attributum* 的意译,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特征,包括形态、动作、关系等等。事物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其中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指隐藏在事物内部、体现这种事物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性。非本质属性一般是指显露在事物外部、只体现该事物某些方面的非本质特性。对于图书属性问题的认识,首先必须把握图书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正确而又全面地认识图书,以便在图书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更好地贯彻党的出版方针。

图书的本质属性在于图书具有积累和传播人类文化科学知识

固有的性质和特征。图书的这种本质特征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图书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汉书·五行志》也有“河洛出图书”的记载。不过，那时所说的“图”，一般是指图画、图章等，“书”也是指借用一些符号来帮助人们进行记忆的一种简单的文化物质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图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载体也随之得到发展。总结我国图书出版发展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图书的形成和发展，要取决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条件：

第一，图书的内容和形式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拓展和延伸，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不断积累和丰富；

第二，用以表达思想和知识的符号（在这里主要是指文字和图画）的不断完整化、大众化和规范化；

第三，符号系统（主要是文字和图画）所依附着的物质材料（如先进的印刷设备）的不断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图书这种文化知识载体在形态上的时代感方面提供了广阔的选择性；

第四，图书生产的制作方法，如编著、出版、印制等手段，是精神内容物化过程中的重要条件；

第五，在精神内容物化过程中，人是主体，人的文化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直接影响到图书的内容和形态。

简单地说，图书即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和符号系统，并按照一定的体例系统地表达人类自身的思想，积累和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一种文化载体。这五个基本的要素，构成了图书独立的有机整体，形成了自己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性。

出版工作的全部含义在于精神内容的物化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书稿的撰写、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等多道工序，包含了人们艰辛的劳动和智慧。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在图书内容的整个

物化过程中,除了自身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规律性和系统性以外,它还要受到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将出版工作作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来探讨,是近几十年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而展开的。这种探讨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是艰巨的。

我们通常说,编辑工作是一种文字工作。这是对精神内容物化过程的一种概括。文字作为符号系统的一种形式,对于图书来说,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如何发达,无字天书总是一种浪漫的幻想。现代人对于文字未产生之前的那一段漫长的历史所知甚少,考古学家对那时一些简单图画의考证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往往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更何况,这也是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或者懂得了利用符号系统的另一种形式——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某一种意向以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精神内容物化过程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图书生产的目性认识。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下,封建统治者们主张“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熊赐履:《学统·序》)。孔子算得上是我国第一位图书编辑家,从他开始,就强调“述而不作,语不怪,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他的工作态度自然是严谨的,但是他有鲜明的倾向性,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也继承了孔子的那一套办法,“纪治乱存亡也”,他的政治目的是要达到“王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图书实行控制,专门设立了机构,制订了具体的管理制度。而对于那些编辑出版对他们有利的图书,凡是参与编纂的人员,“馆宇华丽,酒饌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史通·史官建置》)。

我国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我国灿烂文化,可是我们的图书长期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因而我国的全部优

秀文化遗产未能物化出来留传后世。尽管如此,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从古代到清末,我国已有各类书籍 181 755 部,共 2 367 146 册。辛亥革命以后到 1949 年建国前夕,又出版了各类图书 10 万余种。在这批宝贵的图书遗产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优秀文学作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反抗和对自由、民主的强烈追求。

只有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图书的本质属性才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事业才有可能按照人民自己的意愿健康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强调图书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图书出版事业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全体出版工作者崇高而又繁重的使命。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这个精神对于我们出版工作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平常说坚持图书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这个原则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现在进一步明确了,就是要用是否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标准来衡量,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版工作应当遵守的原则。

图书的商品性属于图书的一种非本质属性,对图书的出版发行起着直接的抑制作用。人类为着共同的物质生产劳动,需要互相联系,需要交流经验和知识。我们的图书就是为着人的这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对这一人类社会现象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推动社会不断前进。我们的许多同志根

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把图书当成一种社会文化规范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对物质和文化加以明确的区别。图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载体(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称,是人类自身的一切延伸),除了受到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外,还直接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发生密切的关系,使图书成为一种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有利于积累和传播文化知识的“实体”或者“载体”。这个“实体”或者“载体”的深刻的社会性在于: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物质文明的程度,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人类精神文明的方式。人们常说,图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里所说的“进步”,应包括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图书的这种特殊载体,它的形成除了受到人类精神文明的制约以外,同时还要受到物质文明程度的双重制约,于是就出现了图书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之间表现出一种拖后或者超前的明显的差异。在物质文明不很发达的古代,甚至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支配下的农业作坊式的生产方法使图书与社会实践活动出现严重拖后的差异,已提醒我们必须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步伐,提醒我们在图书的生产过程中除了注重图书的精神内涵还须注重图书的商品意识。事实上,我国自有图书以来就有过图书商品交换的历史。据《五代史》的记载,早在我国后唐时期,“明宗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印贩卖”。又据《书林清话》卷六记载,“宋时国子监板,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又如,“象山县学汉集,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刷用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又题云:善本镂木,储之县庠,且籍工墨盈余为养士之助……”由此可见,古时对于图书的制作是很讲究成本核算和图书的经济效益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国书价之廉的历史渊源)。

被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模范”的邹韬奋，在他 1940 年写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一文中，对图书的商品性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创办的生活书店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不接受别人的补贴和馈赠。因此，不能不顾及图书的商品性。他说：“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牵涉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业性的含义。”韬奋不主张把商业性和事业性对立起来的作法，他说：“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至使店的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因此他主张在“顾到事业性”的同时必须“顾到商业性”，两者“不许有所偏”。

最近，伍杰同志也特别强调，我们要有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一是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了解中国，二是提高图书的创汇能力，赚取外汇，不要怕说赚钱。这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图书本质特征以及我国出版工作的实际情况的一种科学的概括。

在国外，也有许多的出版家提出或者赞成“出版是一种文化工业”的主张。理由是出版作为一种工业或实业是要盈利的；但是，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它又不能过份考虑物质上、金钱上的问题。怎样处理好文化和实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被认为是出版家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一个人的素质问题，认为“一个出版家如果不顾及文化，你就会因为精神饥饿而失败；如果不顾及实业，你也会因为破产而不能发展文化。”近来，美国把出版社归并到大企业之下，成为企业的子公司，使出版

社成为一种资金雄厚的文化实业。日本和苏联也有类似情况，也主张出版是一种文化企业。

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图书的商品意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宣传教育作用，保证图书社会效益的充分体现。所以邹韬奋特别强调：“我们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他又说：“我们拚命赚钱，拚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韬奋对于图书商品性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图书出版工作来说依然十分重要。

就图书的本质而言，“其所制造及贩卖者即系商品，具有商标与商誉，也具备制造及贩卖之过程及要件，包括资金设备、技术、原料及市场，皆受商业法令之管理，更受商业原则之支配”（王洪钧：《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图书是一种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类共同劳动的成果。在图书的制造过程中，就已经蕴含了图书商品性的内涵，使图书具备自身的价值。这种图书自身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或者曲解这种存在，就会造成我们的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困境。我们不仅不能忽视图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面，同时又不能忽视图书作为物质文明成果的另一面。过去，我们较为注重图书意识形态的一面，结果造成了出版社只管出书，新华书店只管卖书严重脱节的局面。前几年，新华书店图书大量积压，是与这种理论上的盲目性紧密相关的。最近两年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图书的商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作为图书制作部门的出版社，开始由单一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方向转变，促使图书的生产者增强图书的商品意

识,进行产前的成本核算,加强经营管理。当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需要根据图书是精神的本质特征来规范图书的经营活动,增强图书的商品意识,这也是图书在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图书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实践行为。

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图书市场,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混乱局面,在我们的一些出版单位中,一些人为了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指标”,抢先或者重复出版大量内容低劣,甚至黄色淫秽的图书,腐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损坏了党的出版工作的声誉,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不满。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社会上一些并不懂得图书是什么的人,他们见图书有利可图,也纷纷操起了图书“生意”。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行为简直无法无天,他们中有些人的能量也大大超过了正规出版单位。他们不仅用高出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大价钱收买作者的书稿(而有的作者拜倒在金钱面前,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而且还自编自印,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流到全国各地的图书市场,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状况必须尽快进行清理和整顿,除了采用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措施以外,在出版理论研究中,在图书宣传的舆论工作中,要进行反对文化市侩意识的教育,要认真研究图书的出版发行与振兴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密切关系,提高图书编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图书的出版发行事业搞得更好。

(本文作者单位 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